学术专论

近代西方人西藏研究的国家竞争与学术流变

崔华杰

[摘要]　受殖民利益驱使，西方人在近代深入西藏地区开展各类调查工作，间接开启了对西藏的文化研究活动。经游历家、传教士等个体和皇家地理学会等专业组织的努力，英国逐渐将西藏研究从地理情报搜寻转向为学术综合考察。俄国出于地缘政治利益需要，在西藏研究上与英国形成学术竞争，在此期间西方人的成果呈现史学化的特点。美国站在地方、国家和洲际的观察视角，最终将西方人西藏研究由地理游记纳入区域研究的学术体系。

[关键词]　西藏研究　大角逐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　海外汉学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1）－03－0130－0013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长期为域外瞩目。尤其在近代殖民扩张的背景之下，西藏因地缘政治优势，成为西方大国开展政治渗透和文化研究的对象。以传教士、游历家和外交官为主的西方人深入西藏及其周边地区开展宗教传播、资源勘测和地理调查等工作，在探查地方的同时留下不少笔述，不仅记录了在这一地区的所见所闻所感，还着意描述经行地的物产、民族、典章、制度尤其是史地情形。部分西方人专意搜集、整编汉文史料，加以外文文献考辩详释，疏通中外载籍译名，考释西藏的地理、历史与人事，有时还引入史学辅助学科对相关文献和文物作深入考察，从而在研究上出现了学术化和史学化的倾向。

对于近代西方人的西藏研究，学术界已有不同层面的涉及。有的成果散见于中外关系史的专题研究，[①] 有的成果站在藏学角度介绍相关国家和人物，[②] 应该说或深或浅地有所论及，成果多样，与人启迪。然而，这里仍有问题需要解答：在国家和学术结成“权宜婚约”的历史情景之

[收稿日期]　2020-10-26

[作者简介]　崔华杰（1983 —），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济南 250100；huajiecui@sdu. edu. cn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项目青年基金“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史西传研究”（14CZS041）；山东大学历史学科高峰计划项目（10000086393104）。

① 参见王远大：《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93 年；梁俊艳：《英国与中国西藏（1774−1904）》，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 年；喜饶尼玛：《西藏百年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

② 相关研究见：冯蒸：《国外西藏研究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伍光和、唐少卿：《论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亚洲中部地理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 1 期；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年；柳陞祺：《乔治 · 博格尔入藏的使命内容及其执行结果》，《柳陞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 年；励轩：《美国藏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西北民族研究》2016 年第 2 期；苏发祥：《英国藏学研究概述》，《中国藏学》2018 年第 3 期。

中，百余年来西方人的西藏研究有着什么样的发展特点？从服务于现实利益的地理调查到以史学化为表现的学术研究，又有怎样的轨迹和演变？为此，笔者拟将英、俄、美为主的西方人的成果置于近代中外关系的背景，旨在彰显政治和学术之间的合作以及大国之间的竞争，并站在史学史的视角，建构其研究从地理游记转向区域研究的演进轨迹和发展路线。

一、立足印度：殖民时代下的地理勘察和情报搜集

近代西方人对西藏的学术兴趣，始于政治和经济利益所衍生的文化需求。18 世纪以来，英国逐渐侵蚀印度，将之作为在亚洲进行殖民扩张的据点。西藏与印度隔山相望，不仅拥有神秘的宗教文化、丰富的自然资源，又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关口，英国对打开其门户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因此，1768 年 2 月，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致孟加拉总督哈利·维莱斯特（Harry Verelst）的一封公函称："殷切盼望……获取有关西藏、拉萨及中国西部的信息。"①

18 和 19 世纪之交，东印度公司先后派遣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塞缪尔·特纳（Samuel Turner）、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等人赴藏，搜集情报，摸清叩开西藏的门路。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即掌握了西藏的一些信息，多部地理游记问世。1834 年，驻孟买英军上尉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在英国出版《在布哈拉旅行：印度到喀布尔、鞑靼和波斯纪行》，② 在中亚地理概述一章涉及布哈拉和北京与西藏的地理沟通与人员往来。1836 年，奥地利博物学者查尔斯·胡格尔（Charles Hügel）发表的行记讲述其在喜马拉雅山脉和喀什米尔山脉一带的考察，尤其关注了青藏高原的地质和物产。③ 东印度公司随员威廉·穆尔克罗夫特（William Moorcroft）和乔治·垂柏克（George Trebeck）曾深入喜马拉雅山一带调查沿途地理概况，合撰《印度、旁遮普到喜马拉雅山麓之行（1819–1825）》一书在英国出版。④ 另外，巴勒提（Balti）毗邻之地区，也就是被西方人称为的"小西藏"（*Little Tibet*），⑤ 成为进入西藏的前哨，如英人维格纳（G. T. Vigne）于 1834 到 1838 年带队穿越旁遮普（Panjáb）和喀布尔（Kabul），在小西藏和喀什一带以考察名义进行地理勘测，搜集西藏周边的情报信息。⑥

在这一阶段，东印度公司还提供资源，创造条件，支持欧洲研究者开展藏学研究。匈牙利游历家亚历山大·乔玛·德克勒希（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i）为探寻古匈牙利语的地理起源，1820 年 1 月离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在东欧、西亚和南亚等地实地考察，1822 年 3 月间在西藏周边地区周游。停驻列城期间，德克勒希与上述穆尔克罗夫特结识，获赠"不少藏语文献"。机缘巧合，又经"熟知藏语和波斯语"的垂柏克之语言指点和研究帮助，开始对"西藏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奠定语言基础之后，德克勒希获得加尔各答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 of Calcutta*）的经济支持，留居加尔各答，潜心研究西藏文献。他先后搜集各类藏语文献凡 320 卷，

---

① Alastair Lamb,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p. 7.

② Alexander Burnes, *Travels into Bokhara, Being the Account of a Journey from India to Cabool, Tartary, and Persia*, London: John Murray, 1834.

③ Baron Charles Hügel, "Notice of a Visit to the Himmáleh Mountains and the Valley of Kashmir, in 1835",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6 (1836), pp. 343–349.

④ William Moorcroft and George Trebeck, *Travels in the Himalayan Provinces of Hindustan and the Panjab; in Ladakh and Kashmir; in Peshawar, Kabul, Kunduz, and Bokhara*, London: John Murray, 1841.

⑤ 关于小西藏的概念，参见 George N. Curzon, "The Pamirs and the Source of the Oxus (Conclusion) ",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8, No. 3 (Sep. , 1896), p. 242.

⑥ G. T. Vigne, "Outline of a Route Through the Panj–áb, Kábul, Kashmír, and into Little Tibet, in the Years 1834–8",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9 (1839), pp. 512–516.

自认为是“西藏知识与宗教的根基”，可以窥探东方文学的这一“未知领域”，[①] 自此开创了藏学在欧洲研究的先河，被学界誉为“藏学研究之父”。[②]

可以看出，西方人此一阶段有关西藏的著述，不管是地理游记还是文献研究，均时隐时明地显示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客观上配合西方大国的侵略活动，可以说是披着殖民扩张的外衣而从事的文化研究事业。当然，因作者个人的文化素养、学术兴趣等变量因素的影响，仅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除却“殖民扩张的外衣”，回归学术研究的本身，我们发现地理游记这时成为西方人了解西藏这个“神秘之地”的主要渠道，并有着学术转向的变化。从学科属性来看，游记本是文学的一种书写形式，原本用来赢得市场，娱乐大众，因在历史和地理的描述上颇有异国风情而备受读者青睐。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诺威克（Peter Novick）的研究表明，在历史学家走向职业化之前，“历史著作是针对外界的，供一般读者公众阅读”。[③] 荷兰文化史家皮姆·登·布尔（Pim den Boer）甚至定义说，“在 19 世纪，历史读物特别流行——不愧是史学之世纪”。[④] 然而，随着与殖民主义的相伴随行，游记开始承载着西方人认知西藏过去和现在的信息资源，其文本的表现形式和研究指向发生改变：文学的“娱乐性”开始向学术的“求真求实”改变，以赢取市场青睐的通俗性读物开始变为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著述。尽管因个人知识素养不同而在著述的学术性上有所差异，但是，追求真实性与科学性则是其共同的追求。由此，西方人的西藏研究在近代波澜初起。

二、走向合作化：专业学会引领下的研究分流

西方人在西藏研究第一阶段的成果，基本上是站在域外观察西藏的产物，且多散见于个人努力，可谓是东鳞西爪，难成系统。随着探索的深入，特别是经专业学会的推动，此种缺憾逐渐弥补于学术的发展演进之中。

专业学会成立较早的英国，虽然于 1665 年即成立“皇家地理学会”（*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并标榜以“提升自然知识”为建会目标，但事实上，学会尽管以地理学会自居，其会刊所载之文章，不仅未聚焦于地理一类，反而有偏离主题之嫌。据统计，《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从 1665 到 1848 年期间共刊发文章 5336 篇，地理学类文章仅 77 篇，不仅无法企及医学和化学类的 1949 篇，就是与天文学 621 篇、机械学 461 篇、动物学 420 篇、植物学 280 篇相比，在数量上也难与其刊名相副。[⑤] 处于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明显也游离于西方人的知识体系之外，以至于时人感叹说“知之甚少，虽最为重要”[⑥]，“放眼欧洲，没有一位西藏研

① Charles Elliott, “Biographical Sketch of M. Alexander Csoma Körösi, the Hungarian Traveller ; extracted from a Letter addressed by that Gentleman to Capt. C. P. Kennedy, of the Hon. East-India Company’s Service, Assistant to the Political Resident at Dehlí, &c. ”,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1, No. 1 (1834), pp. 128–133.

② Brandon Dotson, “Reviewed Work (s) : 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 Volume One: Csoma Kőrösi’s Planet by P. J. Marczell”,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72, No. 1 (2009), p. 201.

③ 彼得·诺威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杨豫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第 71 页。

④ Pim den Boer, Arnold Pomerans (trans.), *History as a Professi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 1818–1914*,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8.

⑤ Clements R. Markham, “The Fifty Years’ Work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50 (1880), p. 7.

⑥ Clements R. Markham, “Travels in Great Tibet, and Trade between Tibet and Bengal”,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9, No. 5 (1874–1875), p. 327.

究者”。[1]

这种局面在 19 世纪中期发生了改观。经纬度坐标知识的细化和观测方法的改进提供了专业方法的保障，世界知识的需求促进了地理的探险和发现，印度帝国的建立带来了扩张殖民利益的欲望，结果就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开始重心东移，意欲发现“神秘之地”西藏。1852 年，学会主席罗德里克·麦奇生（Roderick Murchison）号召开展“喜马拉雅、西藏和印度斯坦”一带的地理探测和学术研究，因为“英国人对这片区域早就兴趣甚浓”。[2]

专业学会不仅积极鼓呼，集中会员力量对西藏开展专题研究，还将其会刊打造为学术交流的平台，发表关于西藏的各类文章。对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专业学会所办刊物之搜检，发现此一阶段的西藏主题类文章有着如下的研究分流：

首先，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研读，厘清西藏的“地理外延”。1850 年，基督教路德公会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西藏游历考察，按照地理方位予以概貌介绍，指出藏东边界不仅没有进入欧洲人的视野，而且“中国地图所绘制的东部边界地区实际上模糊不清”，建议开展实地考察。[3] 到了 1872 年，英国军人蒙哥马利上校（T. G. Montgomerie）潜入西藏，留下关于南部的考察报告。[4] 对西藏地理较为综合的研究者当属皇家地理学会的克莱门特·马克海姆（Clements Markham）。在 1875 年呈递学会的报告中，马克海姆结合乔治·波格尔和托马斯·曼宁的旅藏日记、匈牙利人德克勒希和德国学者尤利乌斯·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等人的成果，按地理方位将西藏划分四大区域进行论说，涉及地理边限、政治归属、文化形态和宗教信仰等知识。[5]

其次，探查地质、物种和经贸信息，挖掘西藏在殖民扩张中的经济功用。英国以印度为基地，在地理上往东北方向步步渗透，旨在打通连接西藏的陆路交通并最终进入华西地区，这样，不仅能推销英国机器工业生产的大宗商品，更能掠夺西藏乃至中国内地的资源。西藏虽处高原，但物产丰饶，盐金两矿丰富，颇受西方人垂涎。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下，一批西方人打着科学考察的幌子，竞相探查西藏的经济情形。如蒙哥马利在数次涉藏探险中探查金矿[6] 和盐矿[7]分布，有探险家调查喜马拉雅山脉一带和西藏地区的物种情形，[8] 比利时地质学家对青藏高原周边地区尤其喜马拉雅山脉一带进行地形测量和地质调查。[9]

最后，利用中外文献，探讨西藏的宗教特质和民族起源，界定西藏的“身份特征”。一是重视西藏佛教的源流及其宗教生活。诚如在尼泊尔活动的英国学者布莱恩·霍奇森（Brian

---

① Brian Houghton Hodgs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3, No. 2 (1836), p. viii.

② Roderick Impey Murchison, “Address to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22 (1852), p. cvi.

③ Ch. Gutzlaff, “Tibet and Sefa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20 (1850), p. 194.

④ H. C. Rawlinson, “Address to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7, No. 4 (1872–1873), p. 289.

⑤ Clements R. Markham, “Travels in Great Tibet, and Trade between Tibet and Bengal”,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9, No. 5 (1874–1875), pp. 327–347.

⑥ Roderick Impey Murchison Bart, “Address to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4, No. 4 (1869–1870), p. 310.

⑦ T. G. Montgomerie, “Report of the Trans–Himalayan Explorations during 1867”,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3, No. 3 (1868–1869), pp. 183–184.

⑧ Roderick Impey Murchison, “Address to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29 (1859), p. clxxix, note.

⑨ R. Strachey, “On the 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Provinces of Kumáon and Garhwál in the Himálaya Mountains, and of the Adjoining Parts of Tibet”,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21 (1851), pp. 57–85.

Hodgson）所指，通过藏语和蒙古语等多语言文本能够洞察“精细复杂”的佛教哲学及其宗教体系。① 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和柯恒儒（Julius Heinrich Klaproth）的接力之作《法显印度纪行》，在翻译汉文本基础之上，参照藏语文献，加以“丰富的注释”，虽然主要解释“佛教信仰系统”以及“法显时常提到的传奇和学说”，但是最大的学术价值正如时人所论，即通过藏语和蒙古语等译本窥探“印度的早期传统”。② 另外，《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摘编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所译《大唐西域记》，站在宗教视角观察西藏的社会生活。③《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疾呼要重视从佛家典籍搜检佛教历史的学术路向，认为不仅要立足佛教发源地印度本土，还要从西藏、蒙古和中国内地广泛搜罗佛教文献。④ 二是探寻西藏所谓的“种族起源”。这类研究多站在基督宗教本位，勾连西藏与欧洲在文化和种族上的联系。如站在语言学的角度钩沉西藏与雅利安人的种族关系；⑤ 根据对喀什地区的人类学分析论证西藏与犹太人“十支遗失部落”的关系，⑥ 并推断一支“遗失”的犹太人先民实则迁徙到藏南定居；⑦ 还有从人种学分析藏族的身体特征，以辅证西方学界广为流传的“中国人西来说”。⑧

总之，在专业学会的推动之下，西方人在西藏研究上呈现合作化的态势，其成果丰硕，蔚为可观。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考察实质上还不是一种“在地化研究”，即深入西藏、利用汉藏文献开展西藏历史和现实的书写。对于此种不足，罗德里克·麦奇生在总结学会 1871 年年度工作时有所认知，强调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语言、历史和考古学成果，更要了解马可·波罗足迹遍及区域之地志”。⑨ 这一进入中国本土并开展“在地化”研究西藏的学术号召，在《烟台条约》签订之后成为现实。

三、“大角逐”：英俄学术竞争与研究的史学化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侵略野心膨胀，觊觎中国西南诸省疆域，企图打通滇川藏直达印度的陆路通道，与东南沿海的海路通道形成战略互补。为此，英人多次借口游历云南，实则暗地为进藏探路。1875 年英国驻沪领事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在滇边被杀，英驻华公

---

① Editor,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3, No. 2 (1836), p. vii.

② M. Remusat and H. H. Wilson, “Account of the Foe Kúe Ki, or Travels of Fa Hian in Indi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5, No. 1 (1839), p. 109.

③ H. H. Wilson, “Summary Review of the Travels of Hiouen Thsang,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i−yu−ki by M. Julien, and the Mémoire Analytique of M. Vivien de St. Marti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17 (1860), pp. 106−137.

④ Edward E. Salisbury, “Memoir o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 No. 2 (1844), p. 82.

⑤ A. Curzon, “On the Original Extension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 over Certain Portions of Asia and Europe; And on the Ancient Aryans, Indians, or Hindus of India Proper”,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16 (1856), pp. 172−200.

⑥ T. M. Dickinson,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the Ten Tribes of Israel after the Fall of Samaria; With a 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Assyrian Empire at That Period, as Derived from a Comparison of What Is Recorded on the Subject in the Histories of the Jews, the Greeks, and the Persian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4, No. 2 (1837), pp. 217−253.

⑦ H. H. Howorth, “On the Westerly Drifting of Nomades, from the Fif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rt III. The Comans and Petchenegs”, *The Journal of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69−1870), Vol. 2, No. 1 (1870), pp. 84−85.

⑧ H. Bartle Frere, “Address to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8, No. 5 (1873−1874), p. 551.

⑨ Roderick Impey Murchison, “Address to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5, No. 4 (1870−1871), p. 271.

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以之为借口，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及“另议专条”，迫使中国开放西藏，允许外人来藏游历，自此西藏门户大开。[①]

英国在西藏问题上之所以咄咄逼人，亟不可待，除为打通陆路贸易通道，还抱有推行“制俄保印”政策，遏制沙俄南下的政治目的。工业革命爆发之后，列强认识到本国市场有限，加上原料产地不足，为满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便竞相加剧对外殖民掠夺。时至 19 世纪中晚期，在中亚地区，英俄两国在诸强竞争中渐占上风，形成了所谓“大角逐”的格局。[②] 沙俄势力染指蒙古和新疆之后，剑指西藏已然提上日程，倘若在西藏谋得据点，便拥有侵入南亚次大陆的桥头堡。在这种国际政治竞争环境之下，英俄两国支持在西藏地区的科考和研究，逐渐形成“大角逐”式的学术竞争。

得益于先期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英国在西藏研究上占得先机，拔得头筹。《烟台条约》签订后，尤其到了 19 世纪晚期，先是英国公民以个人身份前往西藏地区探险，如 1878 年英国军官吉为哩（William John Gill）从川西深入藏东，[③] 1891 年英国植物学家阿·普拉特（A. E. Pratt）前往打箭炉和藏东地区收集植物标本，[④] 1892 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员荣赫鹏（Fancis Edwards Youghusband）带队探险藏北地区。[⑤] 接着，英政府公然派遣使团，以期与西藏进行政治上的接触。如 1886 年印度孟加拉政府财务秘书马科蕾（Colman Macaulay）经总理衙门准可，率使团往藏游历。使团随行人员有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还有博物学家，在政治接触的同时进行情报勘测之目的显露无疑。[⑥]

较之英国，俄国在西藏研究上起步为晚。1845 年，为满足沙俄资本对外扩张之需要，沙俄帝国地理学会（*Imperial Geographical Society*）成立。凭借沙俄在《北京条约》攫取的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沙俄地理学会在华地理调查有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开始派遣考察队南下，在西藏北部、东北部和东部搜集情报，其中，尤以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y Mikhaylovich Prjeválsky）为首的考察团队在西藏地理调查上能与英国一较高下。行伍出身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在 1867 年探索西伯利亚东部地区，负责统计乌苏里江流域的人口数量，因成绩显赫而被沙俄帝国地理学会授予银质奖章，这促使其决意探索“更广阔的区域”。此后，普氏的地理调查与沙俄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于 1870 年申请 2000 卢布探索蒙古地区，1876 年申请 15000 卢布在西藏开展所谓的“科学侦察”。[⑦]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青藏高原地区开展的“科学侦察”，在塔里木盆地、[⑧] 罗布泊、[⑨] 阿尔金山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第 346–350 页。

② 关于中亚地区“大角逐”这一概念，参见 Garry Alder, “Big Game Hunting in Central Asia”,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 Wealth History*, Vol. 9, No. 3 (1981), pp. 318–330.

③ W. J. Gill, “Travels in Western China and on the Eastern Borders of Tibet”,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48 (1878), pp. 57–172.

④ A. E. Pratt, “Two Journeys to Ta–tsien–lu on the Eastern Borders of Tibet”,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Vol. 13, No. 6 (Jun. , 1891), pp. 329–343.

⑤ F. E. Youghusband, “Journeys in the Pamirs and Adjacent Countri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New Monthly Series, Vol. 14, No. 4 (Apr. , 1892), pp. 205–234.

⑥ The Marquis of Lorne, “The Annual Address on the Progress of Geography: 1885–6”,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New Monthly Series, Vol. 8, No. 7 (Jul. , 1886), p. 425.

⑦ Eugene Schuyler, “The Russian Traveller Prjeválsk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Vol. 21 (1889), pp. 93–95.

⑧ Eugene Schuyler, “The Russian Traveller Prjeválsky”, p. 95.

⑨ Editor, “Geography and Travels”,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Vol. 21, No. 7 (Jul. , 1887), p. 652.

脉、[①]青海湖、[②]哈密绿洲地区、[③]黄河源头[④]等地理科学考察上颇有开创之功，被誉为“现代第一个成功到达罗布泊的欧洲人”、[⑤]“最科学的探险家”，[⑥]“在山志学、水文学和民族学等领域的成就为其他旅行者难望项背”，[⑦]先后获得德国地理学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意大利地理学会的奖章。[⑧]美国《科学》杂志在 1887 年这样报道：

> 过去几年，我们关于中亚的知识是极其缺乏的。尽管在中世纪诸如著名的马可·波罗等很多旅行者穿行蒙古和西藏高原地区，尽管中国人的丝绸商队留下无数报告，但这片区域的地理概况实际上依然不为人所知。直到近年来一些科学考察深入中亚地区方窥其之面貌，其中，俄国普尔热瓦尔斯基因涉足广泛且探险成果厚重而最负盛名。[⑨]

在英俄“大角逐”的国际关系背景之下，以地理调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学术研究，不管是在经费支持还是研究目的方面，事实上均难以摆脱与殖民主义相伴共生的关系，正如英属印度总督乔治·寇松（George N. Curzon）谈及西藏地理考察时所说：“政治可以轻而易举地伪装在科学的外衣里”。[⑩]然而，剥离伪装在科学外衣里的政治目的，也应看到背后涌动的学术潜流，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从学科发展上看，西藏研究史学化倾向明显。英俄两国在西藏的地理调查，不管是关注地文特征、山川河流、地质构造还是聚焦于各类自然资源，在学术归类上更接近于地理学当属无疑。随着对舆地、物种、资源等地域的物理情形研究的深入，西方人开始重视政治、民族、宗教、文化等人文元素在西藏研究上的作用，既着意对研究对象的地理与环境做共时性表述，更尝试从历史流变、地理沿革和民族情形做历时性分析，呈现出由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向史地研究的学术变迁路向。先以 1907 年在伦敦出版的《“未知王国”：一部关于西藏西部的历史》为例。[⑪]有论者在评述时指出，除对藏西地区的地理情形做概貌描述，并涉及西藏之方言、风情、民俗和社会之外，该书最大的学术价值还在于对藏西地区自 7 世纪中期以降的历史以“清晰且连续的记述”，蕴藏着“欧洲人难以利用的诸多历史记载”。[⑫]再如英国外交官员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站在政治关系的角度探讨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少数民族部落的关系。[⑬]又如内地传教士顾福华（Robert Cunningham）在研究中重视宗教在藏区民众生活和身份认同上的作用。[⑭]

在方法上强调学术的总结、交流与争辩，注重史学批判。如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对域外西藏

---

① Editor, “Exploration and Travel”, *Science*, Vol. 10, No. 235 (Aug. 5, 1887), p. 63.

② E. Delmar Morgan, “Prjeválsky’s Journeys and Discoveries in Central Asi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Vol. 9, No. 4 (Apr. , 1887), pp. 213–232.

③ Editor, “Exploration and Travel”, p. 63.

④ Eugene Schuyler, “The Russian Traveller Prjeválsk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Vol. 21 (1889), p. 96.

⑤ Editor, “Geography and Travels”, p. 652.

⑥ Editor, “Proceedings of the Geographical Section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New Monthly Series, Vol. 3, No. 10 (Oct. , 1881), p. 614.

⑦ Editor, “Geography and Travels”, pp. 652–653.

⑧ Eugene Schuyler, “The Russian Traveller Prjeválsky”, p. 96.

⑨ Editor, “Exploration and Travel”, pp. 62–64.

⑩ George N. Curzon, *Russia in Central Asia in 1889 and the Anglo–Russian Question*, London: Longmans, 1889, p. 251.

⑪ A. H. Francke, *A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one of the Unknown Empires*, London: S. W. Partridge & Co. , 1907.

⑫ E. L. S. , “Reviewed Work (s) : *A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One of the Unknown Empires* by A. H. Franck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40, No. 9 (1908), p. 570.

⑬ Edward Harper Parker, “Chinese Relations with the Tartar and Tibetan Tribe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15, No. 4 (Jul–Aug, 1884), pp. 262–266. ; Vol. 15, No. 5 (Sept–Oct, 1884), pp. 351–360.

⑭ Robert Cunningham, “Tibetan, Prayers, Priests, and Pilgrimage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44, No. 8 (Aug. 1913), pp. 489–490.

地区考察的历史回顾，[①] 英国驻印总督沃克（J. T. Walker）[②] 等人刊世的见闻录乃是学术总结的实践之作。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对沙俄帝国地理学会、法国地理学会、意大利地理学会调查成果的关注，成为学术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③] 学术争辩方面，法国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的名著《鞑靼和西藏旅行》虽然早在 1852 年见刊行世，然因记述中国西部疆域的切身体察而被奉为西方汉学经典之作，多次再版，广受欢迎。[④] 该书所富有的趣味性无可置辩，然而对其学术价值的评判却歧意迭见，如有学者认为在部分史事描述上"全然错误"，"文过饰非"，"在史实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上难与普尔热瓦尔斯基相比"；[⑤] 不过，英国汉学家诸如裕尔（Henry Yule）等人予以辩护，认为古伯察之记述难免挂一漏万，但其叙述栩栩如生，使人身临其境，应当予以肯定。[⑥] 不管是研究综述、学术信息交流还是观点商榷，这些成果虽然在内容主旨上各有偏重，但强调学术批判是共同的特征。他们不仅重视史料来源和征信，如考释前人文献史料，订正史实，疏通中外译名，标注重要文献出处，还重视对已有成果的分析和评价。总之，这不仅是西方人西藏研究在专业化上的表现，更是其走向史学化的重要表征。

理论应用上跨学科意识萌发，促进研究多面向深入。考古学、古文字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被运用到西藏研究中，拓宽了单一学科解释的狭窄路径。如考古学方面，既有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在中亚地区所从事的专业考古，[⑦] 还有利用实物史料如玉石、[⑧] 钻石 [⑨] 在华的传播历史，以之解读"中国古代宗教和艺术早期发展阶段"以及"中国古代文化生活的重要阶段"。[⑩] 再如民俗学方法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实践可见对西藏民谣的考察，[⑪] 以及对藏民个体生活史的专题论述。[⑫]

总之，在英俄竞争的背景之下，西方人的西藏研究尽管带有现实性和功利性的特点，然而其还是呈现出一些显而易见的学术变化：内容上从传统的地理、地质、经济等物质生活延伸至语言、思想、宗教、政治等精神领域，方法上从社会、民族和生活的事实描述过渡到民族身份认同、政治外交关系和文明进化的学理分析。这样，西方人西藏研究所发生的知识体系转化，

---

① Editor, "Proceedings of the Geographical Section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New Monthly Series, Vol. 3, No. 10 (Oct. , 1881), pp. 594–635.

② J. T. Walker, "Four Years' Journeyings Through Great Tibet, by One of the Trans–Himalayan Explorer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Vol. 7, No. 2 (Feb. , 1885), pp. 65–92.

③ Editor, "Proceedings of Foreign Societi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Vol. 3, No. 4 (Apr. , 1881), pp. 242–246. ;"Proceedings of Foreign Societi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Vol. 4, No. 4 (Apr. , 1882), p. 244.

④ Evariste Régis Huc (trans. W. Hazlitt), *Travels in Tartary, Thibet, and China*, London: Office of the National Illustrated Library, 1852.

⑤ George C. Hurlbut, "Geographical Not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Vol. 25, No. 1 (1893), pp. 576–577.

⑥ Editor, "Proceedings of the Geographical Section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New Monthly Series, Vol. 3, No. 10 (Oct. , 1881), p. 614.

⑦ M. Aurel Stein, "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1906–8",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34, No. 1 (Jul. , 1909), pp. 5–36.

⑧ Berthold Laufer,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goy and Religion", *Publications of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Series*, Vol. 10 (February, 1912), pp. i–iii, v–xiv, 341–370.

⑨ Berthold Laufer, "The Diamond: A Stud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e–Lore", *Anthropological Series*, Vol. 15, No. 1 (1915), pp. 1, 3, 5–71, 73–75.

⑩ Berthold Laufer,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goy and Religion", p. 6.

⑪ W. F. Connor, *Folk Tales from Tibet, with Illustrations by a Tibetan Artist and Some Verses from Tibetan Love–Songs*, London: Hurst&Blackett, 1906.

⑫ Edward Amundsen, "Trashilhamo (Story of a Tibetan Lassie) —A Study of Tibetan Character, Life, Customs, History, Etc",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40, No. 6 (Jun. 1909), pp. 334–342. ; Vol. 40, No. 7 (Jul. 1909), pp. 402–407; Vol. 40, No. 8 (Aug. 1909), pp. 455–462; Vol. 40, No. 9 (Sept. 1909), pp. 514–520; Vol. 40, No. 10 (Oct. 1909), pp. 579–585.

即由区域特征调查为主的地理学转向以史地研究为表现的历史学，乃是学术演进的自然结果。

四、地方、国家和洲际：美国西藏研究的区域视角

在西藏研究上，与形成“大角逐”学术竞争的英俄两国相比，美国无疑属于后起之秀。虽然早在 1843 年，美国东方学会首任会长约翰·皮克林（John Pickering）在会刊创刊号上呼吁“合作调研东方的历史、文学和科学”，并提请注意北部亚洲特别是“鞑靼、西藏和蒙古”等地。① 然而囿于此后的中国国内现实，华西和西南等地乃属英、俄、法三国在华的势力范围，美国在西藏研究上不得“地利”之便，未能显山露水，分得学术之威柄。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初期，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带团游历藏边地区，花旗国在西藏研究上始独当一面，为国际学界瞩目。柔克义一行虽然行经四川打箭炉时遭到驱逐，未能实现进驻拉萨的期望，然而，柔氏精通藏语，熟谙藏边习俗，其行记“补充了新的重要信息，纠正了先前旅行者在地志和术语上的不少错讹”，② 还记述了使团对藏传佛教仪式的观察和理解。③ “因在四川、青海和西藏地理科学考察上的贡献”，柔克义在 1893 年被美国东方学会授予“金质奖章”。④

清廷覆亡前后，西藏政局不稳，处于多事之秋。1910 年，十三世达赖离开拉萨向印度流亡。1912 年民国肇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西藏乃是中华民国 22 个行省之一，将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此后，在波谲云诡的地区政治环境之下，美国学界号召加强对中国的区域历史研究，以增进对现实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理解。1921 年美国教会史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在《美国历史评论》撰文指出：“现在中日两国及其邻邦的问题，更是引起西方关注的事端，欧美学者逐渐有了责任和权利去研究这些民族的新近历史和远古历史”，“只有如此，才能使得我们更睿智地理解位于太平洋彼岸的邦国”。⑤

出于政治目的，长期以来西藏在部分西方人的研究视阈里乃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实体。如叫嚣着“开放中国”的德国传教士郭实猎指出：“西藏坐落在亚洲高原之巅，周围环绕着世界上最宏伟的山脉，是一个美丽的国度（Country）”。⑥ 中华民国成立前后，西藏政治潜流涌动，有人指出西藏有望受到“英国保护”，⑦ 还有人认为“要想解决目前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在拉萨寻找一个能影响当下时局的代理人”。⑧ 更有一些研究将西藏喻为“印度之大门”，⑨ 民国政府对西藏只能实施“宗主权”。⑩ 与政治呼求互为表里，此阶段西方人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立足地方审视西藏一地，突出西藏的特质，在语言文化、宗教传统、文化归属和区域关系上构建

---

① John Pickering, “Address at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 No. 1 (1843), pp. 1, 42–43.

② Mountstuart E. Grant Duff, “The Annual Address on the Progress of Geography: 1889–90”,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Vol. 12, No. 7 (Jul. , 1890), p. 380.

③ Editor,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at Its Meeting in Philadelphia, PA. , October 31st and November 1st, 1888”,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4 (1890), pp. xxii–xxxiv.

④ George C. Hurlbut, “Geographical Not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Vol. 25, No. 1 (1893), p. 332.

⑤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during the Past Seven Year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6, No. 4 (Jul. , 1921), p. 703.

⑥ Charles Gutzlaff, “Tibet and Sefa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20 (1850), p. 191.

⑦ Paul S. Reinsch, “Diplomatic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Law 1911”,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 No. 1 (Feb. , 1912), p. 30.

⑧ Editor, “Our Position in Tibet”, *The North China Herald*, Nov. 25, 1916, p. 489.

⑨ Thomas Holdich, *The Gates of India*,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10.

⑩ Editor, “Tibet and Manchuria: Alleged Recognition of Tibet’s Independenc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Feb. 1, 1913, p. 348.

西藏的身份认同。

对西方人而言，语言是身份认同最易辨识的标签，这是因为语言不仅是族群内部日常交流的工具，更是保存和传递民族文明的媒介，可以说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藏语属于哪种语系、语族、语支和语种，对民族、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的影响如何，遂受关注，因此，对藏语中的外来语、[①] 西夏语与藏语的联系、[②] 藏语书面语言的起源 [③] 等语言学领域著述在民初之后数量见多，渐为学术风尚，1912 年出版的《藏语语法、口语和文学》[④]、1933 年出版的《西藏方言》[⑤] 和 1946 年出版的《书面藏语简明语法》则是其中的代表。[⑥] 语言之后，宗教则是西藏被外界容易识别的符号。佛教历史、[⑦] 佛教经义、[⑧] 佛教人物 [⑨] 均有研究者涉猎，特别是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于 1931 年出版的《西藏之宗教》一书，[⑩] 主要利用了藏语史料详述佛教在西藏乃至蒙古地区的兴衰发展历史。另外，英国官员奥斯丁·瓦代尔（L. Austine Waddell）1895 年出版的《西藏佛教》一书于 1934 年重印再版，[⑪] 抛去书中的政治偏见和宗教误解，在知识上“为了解西藏西部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时隔近 40 年的再版显然说明了宗教对于了解西藏的重要性。[⑫] 建构语言和宗教的身份属性之后，自然推演到民族这一概念，如《西藏：其地区和人民》[⑬] 和《西藏人》[⑭] 两书就是其例。解构语言、宗教、民族的最终目的，旨在更好地了解西藏社会。1924 年查尔斯·贝尔出版《西藏的过去和现在》一书，[⑮] 为西方人揭开西藏的“神秘面纱”，这时“西藏不再是神秘之地”。[⑯]

概言之，西方人将西藏列为研究的单一主体，利用藏语文献，强调西藏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态的独特性，表面上主要探讨西藏的身份属性，但结合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明显能揭示出其本质乃是强调西藏与中国内地的身份差异，意图虚构西藏乃是独立政权实体的形象，以满足在中国还有南亚地区的外交利益诉求。然而，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政治现实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始终实施着直接有效的行政管理，如 1912 年设立的蒙藏事务局管理蒙藏事务，承袭清朝驻藏大臣职权，明确西藏乃“中华民国国土，依其固有之疆域”。[⑰] 这种政治外交现实，不得不促使西方人将西藏与中国内地连接起来，具体而言就是站在国家层面分析西藏与中国内地的互动和联系。

---

① Berthold Laufer, “Loan−Words in Tibetan”,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17, No. 4/5 (Oct. −Dec. , 1916), pp. 403−552.

② Berthold Laufer, “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17, No. 1 (Mar. , 1916), pp. 1−126.

③ Berthold Laufer, “Origin of Tibetan Writ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38 (1918), pp. 34−46.

④ Herbert Bruce Hannath, *A Grammar of Tibetan Languag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Calcutta: the Baptist Mission Press, 1912.

⑤ Georges de Roerich, *Dialects of Tibet. The Tibetan dialect of Lahul*, New York: Urusvati Himalay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Roerich−Museum, 1933.

⑥ Theos C. Bernard, *A simplified Grammar of the Literary Tibetan Language*, California: Tibetan Text Society, 1946.

⑦ Kenneth J. Saunders,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ketch”,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Vol. 3, No. 3 (May, 1923), pp. 256−275.

⑧ Kenneth K. S. Ch’en, “The Tibetan Tripitak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9, No. 2 (Jun. , 1946), pp. 53−62.

⑨ Charles Bell, *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 London: Collins, 1946.

⑩ Charles Bell, *The Religion of Tibe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1.

⑪ L. Austine Waddell, *The Buddhism of Tibet*, Cambridge: W. Heffer, 1934.

⑫ J. K. Shryock, “Reviewed Work (s) : The Buddhism of Tibet by L. Austine Waddel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55, No. 2 (Jun. , 1935), p. 225.

⑬ F. Grenard, *Tibet: the Country and its Inhabitants*, London: Hutchinson, 1904.

⑭ Charles Bell, *The People of Tibet*, Oxford: Charendon Press, 1928.

⑮ Sir 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24.

⑯ F. W. T. , “Reviewed Work (s) : *Tibet Past and Present* by Charles Bell”,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66, No. 1 (Jul. , 1925), p. 59.

⑰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治藏行政法规》，五洲传播出版社，1999 年，第 17 页。

站在国家层面观察西藏，首要前提就是承认西藏乃是中国的行政区域。首先，在部分西方人的地理话语表达里，西藏为中国固有土地确然无疑，如有研究指出“中国”在地理概念上实际上包含四个区域，分别是中国本土、满洲、西藏、蒙古与伊宁（Kulja）及叶尔羌一带区域；① 在1925年一篇探讨西藏与东南亚地理关联的文章中，西藏这个地理名称前已加缀限定词“中国”并标注为“中国西藏（Chinese Tibet）”。② 接着在政治话语中，西藏也被纳入中国政体的范畴，如柔克义撰写长文回顾西藏与历代中央政府之关系，向西方介绍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政治整合和文化影响。③

承认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行政权力之后，站在国家层面观察西藏就拥有学术合法性和立论的前提。1939年出版的《西藏：从中文史料看其地理、人种和历史概论》一书利用汉藏文献诠释西藏史地，④ 1941年费正清和邓嗣禹合写《论清代朝贡体制》一文则是从外交体系探讨清廷与地方的关系，⑤ 均是站在国家层面审视西藏的学术应用。这种“中国取向”在理论上的益处，在1948年《太平洋评论》发表的《中国：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一文中得到详尽阐述。文章指出，传统中国有“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和“亚文化”（Secondary Culture）之别。所谓“主流文化”体现于内地村镇社群，其基础是广泛存在且规模较小的农业区域；“亚文化”则流行于边疆地区，如既是地理边疆又是文化边境的蒙古、新疆和西藏，在这里，边缘文化逐渐从主流文化分离，衍生为“亚文化”。因此，只有理解中国处于文化与地理边境且“占据过半国土面积”的地区，“才能正确看待中国”。⑥ 总之，在他们看来，从“中国”这个空间维度观察西藏等边疆地区与“中国本土”的互动和联系，不仅能加深理解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还能换位理解中国疆土辽阔、民族众多的社会现实，故而有着强烈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沿袭站在国家层面审视西藏这个学术路向，还有研究“攀升”至洲际的层面予以诠释。究其本质，这种“洲际取向”的学术源起，概因西藏在沟通中国内地与边疆、联结中国与亚洲的地缘优势。在中国内陆地区，西藏北与新疆、青海相邻，东向和东南向同云南和四川接壤；站在域外审度，西藏在南向和西向与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及克什米尔地区毗邻，处于亚洲地理之要冲。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英、俄角逐西藏研究期间所出的《西藏与中亚》一书，⑦ 其阐发的主题显然表明了西方人对西藏在亚洲的地理位置及区位优势的清楚认知。

在何种层面架构西藏与亚洲的联系和互动关系？ 1925年，斯坦因在《地理学报》发表《内亚：历史中的地理因素》长文，结合其科学考察经历，指出内亚这个地区因“地理特色”而在世界历史文明中占据重要地位。他定义的内亚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北起天山，南倚将西藏分割成盆地地区的昆仑山脉”。⑧ 后来，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认为所谓“内亚地区”主要

---

① Editor, “Proceedings of the Geographical Section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New Monthly Series, Vol. 3, No. 10 (Oct. , 1881), p. 614.

② J. W. Gregory and C. J. Gregory, “The Geology and Physical Geography of Chinese Tibet, and Its Relations to the Mountain System of South−Eastern Asia, from Observations Made during the Percy Sladen Expedition, 1922”,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213 (1925), p. 173.

③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 1644−1908”,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11, No. 1 (1910), pp. 1−92.

④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Tibet: A Geographical, Ethn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Sketch, Derived from Chinese Sources*, Peking: Wên tien ko shuchuang, 1939.

⑤ J. K. Fairbank and S. Y. Tê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 No. 2 (Jun. , 1941), pp. 135−246.

⑥ Li An−Che, “China: A Fundamental Approach”, *Pacific Affairs*, Vol. 21, No. 1 (Mar. , 1948), pp. 59−60.

⑦ Sven Hedin, *Central Asia and Tibet: Towards the Holy City of Lassa*,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903.

⑧ Aurel Stein, “Innermost Asia: Its Geography as a Factor in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65, No. 5 (May, 1925), p. 378.

是指未拥有海岸线的地区，“包括西藏地区、外蒙古、阿富汗以及苏联下属的一些共和国，亦涵盖中国西北地区的甘肃和宁夏地区”。[①] 倘若不论“内亚”的具体地理范围，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人将西藏纳入洲际乃至世界的地理视角，作为内陆空间来加深对亚洲区域历史乃至全球历史的理解，则是不争的事实。如斯坦因在中亚尤其新疆东部和西藏等地开展的科学考察，就是从考古遗物上“探寻佛教印度、中国和‘希腊化近东’（Hellenized Neat East）对古代文明发展的融合影响”。[②] 再如美国东方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的贡献》一文所论西藏在语言、植物、民俗和律法方面在中伊古代交流上的作用，也是站在洲际角度诠释西藏的学术典范。[③] 另外，1929 年的《中亚的挑战》[④] 和 1937 年的《西藏及其邻邦》两书，[⑤] 亦是洲际取向的学术表现。

如果说地方视角强调的乃是西藏相较之其他中国区域所彰显的“个性因子”，那么，国家层面和洲际取向的落脚点则是西藏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共性因子”。归结到学术实践层面，站在地方、国家和洲际的空间考察维度可以说起着彼此补益之作用，正如拉铁摩尔在内亚视角上的立论所言：“既能整合伊朗、印度、中国、日本和俄国这些外环研究”，“又能深入蒙古、土耳其、通古斯—满洲和西藏等内核研究”。[⑥] 由此观之，美国学界吸收“外环”和“内核”之成果，注重理论创新，将西藏纳入区域研究的学术实践，最终实现了西方人西藏研究从地理游记转向区域研究的学术衍变。

五、余论

正如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所论，近代时期西方人在欧洲以外地区开展的地理考察，“不是出于冒险而从事旅行，而是怀有科学目标，并获得国家赞助”。[⑦] 这番论断事实上也契合本文的研究主题。西方人之所以在近代时期对西藏产生持续的学术兴趣，显然也是源自政治和经济利益所衍生的文化需求，从属于国家利益和学术研究达成的“权宜婚约”。正因如此，英、俄、美三国先后投入，相竞逐鹿，呈现出国家分野的学术态势。这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学术竞争，也给西方人西藏研究带来了学术演化：在研究性质上由服务国家利益到学术意识的觉醒，在叙事形式上由游记到专题研究，在方法上由描述到分析、解构乃至重构，在理论上由单一学科的建构到跨学科的诠释。结果就是，西方人的西藏研究最终由地理游记而进入区域研究的学术体系，在国际藏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另外，我们也不可忽视的是，在国家和学术结成“权宜婚约”的近代历史情景之中，西方人在研究中始终面临着现实需求与学术关怀这个时代命题。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他们在近代时期之所以开展西藏研究，难以摆脱与其母国利益的伴生关系，可以说是将学术研究置于现实需求之中。然而另一方面，他们最终突破了这一现实需求，秉持学术精神，注重理论创新，

① Owen Lattimore, “Some Recent Inner Asian Studies”, *Pacific Affairs*, Vol. 20, No. 3 (Sep. , 1947), p. 318.

② Aurel Stein, “A Third Journey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1913–16”,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48, No. 2 (Aug. , 1916), p. 97.

③ Berthold Laufer,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Publications of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Series, Vol. 15, No. 3, (1919), pp. i, iii–iv, 185–597, 599–630.

④ Mildred Cable, *The Challenge of Central Asia: A Brief survey of Tibet and its Borderlands, Mongolia, North–West Kansu, Chinese Turkistan, and Russian Central Asia*, London: World Dominion Press, 1929.

⑤ Edward Thomas Williams, *Tibet and her Neighb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7.

⑥ Owen Lattimore, “Some Recent Inner Asian Studies”, *Pacific Affairs,* Vol. 20, No. 3 (Sep. , 1947), p. 318.

⑦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亚洲的去魔化：18 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刘兴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103 页。

在不同阶段推动研究范式的相应变迁。对之我们也应有公允评介并予以合理借鉴。

References

Cable, Mildred. *The Challenge of Central Asia: A Brief survey of Tibet and its Borderlands, Mongolia, North–West Kansu, Chinese Turkistan, and Russian Central Asia*, London: World Dominion Press, 1929.

Feng Zheng. *Guowai Xizang yanjiu gaikuang* (A survey of Tibetan studies abroad).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79.

Hedin, Sven. *Central Asia and Tibet: Towards the Holy City of Lassa*,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903.

Li Xuan. "Meiguo zangxue de lishi, xianzhuang he weilai" (The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of Tibet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Xibei minzu yanjiu* (North west ethno–national studies) (2) 2016.

Liang Junyan. *Yingguo yu Zhongguo Xizang, 1774–1904* (Britain and Tibet of China,1774–1904). Lanzhou: Lanzhou daxue chubanshe, 2012.

Liu Shengqi. *Liu Shengqi zangxue wenji* (Liu Shengqi's collection of Tibetan studies). Beijing: Zhongguo zangxue chubanshe, 2008.

Su Faxiang. "Yingguo zangxue yanjiu gaishu" (An overview of Tibetan studies in Britain). Zhongguo zangxue (China Tibetology) (3) 2018.

Taylor, Bayard. *Central Asia: Travels in Cashmere, Little Tibet and Central Asia*, New York: Charles Sribner's Sons, 1885.

Wang Yuanda. *Jindai Eguo yu Zhongguo Xizang* (Modern Russia and Tibet of China).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1993.

Wu Guanghe and Tang Shaoqing. "Lun pu er re wa ji zai yazhou zhongbu dili yanjiu zhong de diwei he zuoyong" (On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Prjeválsky in the geographical study of central Asia). *Lanzhou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1) 1986.

Wu Kunming. *Zaoqi Chuanjiaoshi jin zang huodong shi* (History of early missionaries' activities in Tibet). Beijing: Zhongguo zangxue chubanshe, 1992.

Xirao nima. *Xizang bainian shi yanjiu* (A study on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ibet). Beijing: Sheke wenxian chubanshe, 2015.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Academic Evolution of Modern Western Studies of Tibet

CUI Huaji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huajiecui@sdu. edu. cn)

Abstract: Driven by colonial interests, Westerners went deep into Tibet to carry out various surveys in modern times and indirectly started cultural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ibet. With the efforts of travelers, missionaries, and other individuals, as well as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Britain gradually changed the study of Tibet from a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earch to a comprehensive academic investigation. For the sake of geopolitical interests, Russia engaged in academic competition with Britain in Tibetan studies, and Western studies made historic contrib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bserv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eventually extended Western Tibetan studies from the geographical travel sketch to the academic system of regional studies.

Keywords: Tibetan Studies, Big Game hunting, British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verseas sinology